



孙中山与北京

SUNZHONGSHAN YU

BEIJING

黄宗汉 王灿炽编著

孙中山与北京

SUNZHONGSHAN YU BEIJING

黄宗汉 王灿炽 编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存来禄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与北京/黄宗汉 王灿炽 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

ISBN 7-01-002454-5

I. 孙…

II. ①黄… ②王…

III. 孙中山-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9565 号

孙 中 山 与 北 京

SHUNZHONGSHAN YU BEIJING

黄宗汉 王灿炽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8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2,500 册

ISBN 7-01-002454-5/K · 527 定价：48.50 元

凡 例

一、本书以记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三次北京之行为主，兼收与此活动有关的资料。孙中山逝世后的治丧以及送殡等有关资料，亦酌情收录。大体上，首条列大事记，其次在按语中辑录这些活动的史料，并适当加以注释或考证。

二、本书纪年皆用公元纪年，并于每年之首同时标明清帝年号或中华民国纪年以及岁次干支。记事时，同一日首条标明时间，其余各条均用“△”标示，一般以当日活动的时间顺序排列。凡无法确定何日者，则标明某月“上旬”、“中旬”、“下旬”或“是月”等。

三、本书所据资料，均详细注明出处。首次写明书名或报刊名称、篇名、作者、卷数、出版时间、出版单位、版次等。重复引用时则从简。

四、本书按时间顺序记述，起于1894年，迄于1929年，共分五章：第一章：首次莅京（1894年）；第二章：二次莅京（1912年）；第三章：三次莅京（1924—1925年）；第四章：治丧纪事（1925年）；第五章：移灵纪实（1928—1929年）

前 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是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卓越领袖，是与形形色色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不怕挫折和失败，与时俱进、英勇奋斗的无畏战士。他的业绩、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民珍惜与景仰。

孙中山在充满坎坷与艰难的革命一生中，曾三次来北京。北京自元明以来一直是我国的政治中心，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政局直接制约和影响全国的变化和发展。孙中山三次来北京，正值清末民初。其间，中央政权更迭不断，政治斗争异常尖锐。这种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推动和影响人们、包括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志向。孙中山作为有志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代伟人，他每次来北京，都处于中国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他在北京的活动，既加深了自己对北京乃至整个中国政局的认识，又加深了与北京的感情，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改造中国、追求中国独立和富强的决心、逐步提高和完善着实现上述目标的政策和策略；尤为重要，通过他的言行和活动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使北京人民一次又一次目睹了他的光辉形象和伟人风采。孙中山的北京之行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北京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这是北京的光荣和骄傲。

（一）走向革命

——1894年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到北京，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当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异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专制、反动的清王朝面对日本的公开挑衅，不仅没有有效抵制侵略的志向和能力，而且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无可挽回的腐败。最高统治者慈禧，长期以来只是集中精力建立其专制权力，对中国近代化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采取得力的措施。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京师沦陷、皇帝北狩、最后病死热河，清廷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疮巨痛深”，开始“洋务运动”，创建海军和一些军事、民用工业的话，那么当慈禧个人权势得到巩固，北洋海军组建之后，统治集团立即感到满足而忘乎所以，致使我国经济、军事实力一直没有摆脱被动、落后的局面。特别是面对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侵略，他们充耳不闻，闭目不见，仍沉溺于权势争斗之中。慈禧以建立个人专制、追求生活享乐为第一目的；不少大臣则专心于向慈禧争宠献媚，相互之间对于国事、公事则推诿、塞责，对于个人私利则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结果竟出现办海防无钱而将大量财力用于修整官庭园林的咄咄怪事。甚至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之际，最高统治集团仍将主要精力用于为慈禧操办生辰庆典，大张旗鼓为其庆祝六十寿辰。北京的朝廷显示一片醉生梦死的丑态。不久，甲午战争失败。这一切，给孙中山以极其强烈的刺激。

此前，孙中山曾随家人到檀香山读书，直接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既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曾使美国实现独立富强的历史名人诸如华盛顿、林肯等极为景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现实和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对比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状态，孙中山逐渐产生新的社会理想：即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来“改良祖国”。他即成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后来，他到香港学医，并在毕业后悬壶广州、澳门，直接接触社会各阶层人民。广大人民悲惨的境遇和顽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事实，更给予孙中山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从此，他从医人转向医治社会，集中精力探讨社会改良，追求祖国富强的方案；一次又一次上书封建官府，企图依靠旧政权的力量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与此同时，在与亲密友朋中，则畅谈革命，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并曾在1893年与陆皓东等在广州集会时，建议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团体。这一建议虽然没有实现，但说明孙中山思想中革命的成份也在萌生、发展。然而，在当时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思想仍占主导地位。1894年，在他一系列上书当地官府失败后，开始将希望寄托到曾一度被时人认为开明的洋务派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身上。他期望通过这位在晚清政坛颇有权势的官僚影响清廷，以实现其改造中国的主张。为此，他精心起草了著名的《上李鸿章书》，并得到郑观应、盛宣怀等人的支持、介绍，千里迢迢由广州经上海赶到天津，结果并没有得到李鸿章的接见，而使其上书搁置。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满怀热情地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

希望以此解除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束缚，实现祖国富强。然而，孙中山美好的愿望与满腔热情，却遭到无情的冷落。孙中山旋与好友陆皓东赶赴北京，看到、听到的是一幅又一幅令人失望的官场丑态。晚清宫廷的腐败与不久传来的甲午战败之讯，使孙中山很快得出：“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府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全集》第7卷）的结论。这一切，无疑给满腔热血、寄希望于清廷的孙中山以巨大打击。使其如冷水浇头，顿感失望。为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不得不与清廷决裂。当时，孙中山以出国考察为名，办理手续出国，实则走出国门，毅然走上武装革命推翻清廷的道路。综观孙中山思想的转变过程，使我们明显感受到他的一大特点：即与时俱进，不怕挫折，愈挫愈奋的精神。当他通过实践，感到清廷与李鸿章均不可指望时，立即抛弃原先的想法，将心中孕育已久的武装革命思想开始付诸实践。北京之行，无疑成为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本书收集的关于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的史料，尽管仍极有限，但为大家了解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二）为巩固共和而斗争 ——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

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来北京，正值北京政坛乃至全国政局处于极其复杂、动荡的时期。

此前，在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孙中山出于尽快推翻清廷，消灭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需要，也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革命党人甘为“公仆”的高尚道德情操，毅

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而举荐袁世凯继任。此举，不仅使中华民国得以在表面上完成统一，而且为在中国创立民主政治的历史树立了光辉典范，给亿万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此后的中国政局并没有因民国的“统一”走向好转。袁世凯反动集团在表面上竭诚拥护民主共和的假面具下，一步步排斥、打击乃至镇压革命力量；社会各阶级、阶层则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口号下纷纷组织政党，造成一时政党林立、且不断分化组合、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各政党极力在政治舞台上表现自己，以达到参政、议政、乃至控制政权的目的。其间，同盟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与袁世凯集团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仍处于对立地位。两者之间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焦点。由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各党派团体纷纷将总部迁往北京。北京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斗争的中心。由于袁世凯集团控制着北京乃至北方政治势力，不断制造迫害革命党人事件，使北京政坛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当时的北京，在鼓吹民主共和的假象下，充满刀光剑影。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不久，袁世凯就发出邀请，甚至一次又一次派人南下劝驾，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其态度之“诚恳”，言论之“谦恭”，无与伦比。此前，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放心，曾对其在南北和谈中背信弃义的举动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予以揭露与打击。这就是说，孙中山对袁世凯集团还是颇有警惕和防范的。但当民国在形式上统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中山还是真诚地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愿为民主共和制度的确立与中华民国的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临行前，北京刚刚发生

袁世凯与黎元洪合谋杀害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事件，并传言张振武与黄兴有牵连。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孙中山也深知此行危险。正如他在天津各界欢迎会上演讲时指出的“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当时，不少革命党人为孙中山等北上人士的安全担心，有的坚决劝阻。然而，孙中山为了民国前途，不为所动，毅然北上，表现了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在8月23日答复记者询问北上之用意时，明确指出：“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从孙中山此次北京之行的言行可见，他的方针是：调和南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巩固共和。

孙中山到京，受到北京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一时万人空巷，齐涌火车站一带；扶老携幼，争睹领袖风采。各报刊争相采访、报道，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旋风。其影响之大，作用之巨，为历史上所仅见。因此，孙中山此行成为北京乃至国内外政治舞台关注的焦点。

孙中山这次在北京的首要活动是与袁世凯会谈。这是调和南北感情，实现政局稳定的关键。据参加会谈的梁士诒在其《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透露，会谈一般只有孙中山、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参加，所谈都是国家大事。可惜这些会谈内容均没有记录发表。而据现已搜集到的资料看，双方谈话达13次之多，谈话内容既涉及当时南北统一这一敏感的政治话题，又广泛涉及到经济、外交乃至当时政府组阁等诸多方面，为世人所瞩目。对于会谈结果，孙中山认为是满意的，并得出袁世凯尚可信赖的结论。

孙中山在北京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于8月25日在虎坊桥

湖广会馆主持成立国民党大会并被推举为该党理事长。应当看到，刚刚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当时关注的焦点是南北统一和民国实业建设，但不可否认仍十分关注政治斗争。在政党林立、争斗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他不仅同意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而且利用来京之机，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这在国民党历史上无疑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他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指出的：“国家之有政党，原以促政治之进行，故世界文明各国，无不有政党以维持之。今日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则本党之成立，即为中华民国富强之嚆矢焉。”国民党的成立，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坚持进步，坚持实行政党政治的目标。国民党成立后，为巩固共和制度，继续反对和防止封建专制，特别是为抵制袁世凯组建所谓“超政党”内阁以实行个人专权，争取议会多数，组建国民党内阁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孙中山已辞大总统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成立不失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创建民主政治初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在北京更广泛而具深远意义的活动，是利用多种场合宣传他的主张和思想。当时，各政治机关、各党派团体纷纷举行欢迎会。孙中山不顾旅途疲劳、连续出席会议，发表演讲，宣扬民主共和制度，鼓吹民生主义，特别突出强调实业建设，并自告奋勇担当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得到袁世凯当面允诺。此后，孙中山曾专门乘火车考察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并投入极大精力，组建铁路公司，全面提出了自己对铁路建设的构想。他从边疆到内地，从西北到西南，对

各条干线、支线都拟定得十分具体，而且主张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以便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改变我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交通工具，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孙中山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针对中国国情，以对外开放的思路，为我们设计了振兴中华的蓝图。他的设想不仅比同时代人高明得多，而且至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

毋庸讳言，孙中山此次北京之行曾对袁世凯表示了较多的信任，并要求革命党人“对袁总统万不可存心猜疑”，并称赞“袁总统才大”，使袁捞到了一些政治资本。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揭露、抵制及此后对袁世凯的斗争，特别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被杀而发起“二次革命”，不能不看到孙中山对以袁世凯为首的统治集团是存有戒心、多方警惕的。这里，既要看到袁的本质有个暴露过程，革命党人对其认识也有个加深过程；也不可排除在南北统一之际，孙中山此次北京之行在政治斗争不利条件下，致力投身实业救国的良好愿望和在政治上的策略思想。否则，我们便难以理解孙中山先生的这些言行。尤为重要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孙中山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在诸如解决南北冲突、借外债、裁军、军民分治及迁都等问题上，都一再坚持自己观点，表现了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革命政治家本色。这一切说明，孙中山等人的北上活动，“调和”、“疏通”南北感情的目的是求得中华民国的真正统一和巩固，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因此，孙中山等与袁世凯的会谈，除同意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外，在上述问

题上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孙中山在北京期间大力宣传民主共和、创建国民党、宣扬民生主义、维护民国统一及所表现的“公仆”形象，在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社会进步。本书辑录的有关史料，则为此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三）伟人的最后日子 ——1924～1925年孙中山第三次到北京

1924年底，孙中山第三次到北京，并最终在北京逝世。

从1912年到1924年，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中央政权头面人物如走马灯一样不断地更换，各派军政集团不断发生争斗，而实权一直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与此同时，各地方军阀则连年争战。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收买和控制军阀势力，以利于它们制造混乱、攫取更大权益；不少军阀则以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进一步为虎作伥。在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下的军阀统治，造成社会空前黑暗和倒退，人民再次饱受苦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屡经严重挫折和失败后，日益认识了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动嘴脸，以顽强斗志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寻找各种力量，推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参与和帮助下，于1924年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方针，确立了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大会的各项决策，体现了时代的需要，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预示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立即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推动工农运动、镇压商团叛乱、组织北伐战争，期望尽快结束军阀混战的黑暗的局面。中国民主革命再次出现高潮。

这时，北方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并联合段祺瑞、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冯玉祥等遂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面对北方发生的变化，孙中山力排众议，决定再次北上，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以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使国家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全国很快掀起促成国会会议运动的高潮。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扶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黄埔军校出发，先到香港，换乘日本“春洋丸”于17日到上海，赴莫利爱路本宅休息。当时，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采取种种手段威胁、抵制孙中山，惧怕其宣传反帝主张。孙中山则通过召开记者会与发表书面谈话，针锋相对宣传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外国租界的主张。21日，孙中山乘“上海丸”离沪赴日本，向国外宣传他的主张。30日，由日本改乘“北岭丸”赴天津。12月4日晨抵达天津大沽。

孙中山因带病长途远行，到天津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不得不改变立即进京的计划，在天津治疗。与此同时，北方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段祺瑞、张作霖已控制北京政府，宣称对内召

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统治；对外“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相对抗。孙中山一方面要与疾病作斗争；一方面要与军阀作斗争。对封建军阀依靠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行表示了极大愤慨。他在天津张园工作、治疗26天，但病情日益恶化，为满足各界的期待并方便就医，仍启程赴京。

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尽管朔风凛冽，但北京的学生、民众及各界代表十万余人早已自发赶赴车站。他们扶老携幼，挥动各种颜色的小旗，向孙中山先生表示欢迎和崇敬。孙中山则抱病坚持步行下车，向欢迎的群众含笑答礼，然后换乘汽车前往北京饭店。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势加剧，卧床不起，无法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与反动势力斗争，与病魔斗争，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其间，对于段祺瑞政府召开的所谓“善后会议”进行了坚决抵制；同时特别关心正在进行的北伐，不时向左右垂询一切。对于来访的各界人士，在精力实难胜任的情况下，委派专人分别负责接待，并不时与军政头面人物周旋。然而，孙中山疾病却进一步恶化。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移住协和医院。下午手术后，即确诊为肝癌。不久，孙中山又由协和医院移住铁狮子胡同行辕。其后，虽经医生竭力抢救，但终无力回天。孙中山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几十天中，于3月11日先后在早已拟定的《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字，并签发了由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书》。在弥留之际，他对守护身边的同志说：“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统一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

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甚瞑目”。最后，孙中山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遂不能复言。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孙中山逝世，震惊了全国，广大人民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国民党治丧办事处立即通电全体党员左臂缠黑纱7日，停止宴会7日，以致哀悼。全国各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均下半旗致哀。孙中山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其灵柩于19日由协和医院移往社稷坛。当时，沿路人山人海，不少人泪流满面护送灵柩。在社稷坛公祭的日子里，民众自动举哀，结队宣传，用各种方式悼念孙中山。许多国际友人也纷纷前来吊唁。花圈、挽联何止万千！4月2日，孙先生灵柩移往西山碧云寺。北京几十万民众自发地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他们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表达自己的哀思和心愿，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形成规模空前的示威和声讨。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于北京、终于北京。他的革命一生与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在北京的言行，他热爱祖国，献身民主革命，致力于祖国独立、统一和富强的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激励我们在新时期奋勇前进的巨大精神财富和宝贵历史遗产。然而，遗憾的是，有关孙中山三次来北京的史料一直缺乏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大量记载还保存在档案、报刊和时人笔记、回忆录等资料中。为此，我们不揣浅陋从当时保存的上述文献中，系统辑录了这份《孙中山与北京》献给读者。这既是对孙中山

先生诞辰 130 周年的纪念，又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础。相信它的出版，必将对于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实践他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遗愿，加速我国特别是北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学识和条件，我们辑录的这份资料仍不够丰富和完备，误漏仍所难免，敬请海内外广大读者特别是各位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并将所知有关资料线索或资料函告编者，以期本资料进一步完善。

黄宗汉

1996 年 5 月 5 日